

（二〇一九年五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追根溯源】	工人阶级：从“领导一切”到失去一切	程晓农
【往事非烟】	我参与了北师大的“九·七事件”	林贤光
【研究报告】	1966—1968年北京大学红卫兵的派系冲突（下）	魏昂德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追根溯源】

工人阶级：从“领导一切”到失去一切

· 程晓农 ·

文革已经是50年前的历史事件了，但是，近年来社交媒体上又出现了关于“文革再现”的议论。准确地讲，文革并未再现；然而，当下社会各阶层当中确实存在着怀念文革时代的人群，其中主要是下岗再就业或退休养老的国企职工。他们是文革时期的一个受益群体，又是被改革抛弃的社会遗产。为什么昔日的国企职工怀念文革时代，仅仅是因为他们社会地位的滑落，还是他们信奉的价值观在拷问制度的转型和社会的演变？

◇ 中国转型的成与败

毫无疑问，文革以后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制度转型和社会演变，虽然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讨论改革的文献汗牛充栋，但是，所有这些研究都忽视了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而国企职工怀念文革时代这个社会现象，却把这个被全世界中国研究者忽略的问题摆到了桌面上：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被官方意识形态和宪法共推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是如何从文革时期的历史巅峰地位落入改革之后的社会底层的；进一步看，经历了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之后，社会大众的价值观是否相应地发生变化，而原国企业职工们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知又如何影响着中国今后的转型。这是一个值得文革研究者和现实问题研究者共同关心的话题，其重点不是下岗工人的困难处境等旧闻话题，而是制度转型与原国企业职工这个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影响，简单来说，就是如何通过分析文革的社会遗产来认知中国转型的成与败。

回顾红色中国的历史，工人阶级既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又是毛泽东巩固文革成果所借重的社会力量，同时，工人阶级的“主人翁”角色还是改革前十年主导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价值观念。讨论工人阶级社会地位和工人阶级话语从文革到改革的命运变迁，可以发现毛泽东主义的民间认同的社会根源；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随着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边缘化，改革话语是如何逐步空虚化的；最后，为什么改革落入了意识形态困境，而改革的意识形态困境又如何影响到未来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路径。

过去40年来，习惯性的分析和研究框架是把改革前和改革以来隔离开来，改革前属于现代史研究，而改革开放以来则属于现实问题研究。但是，许多研究课题，比如，工人阶级的边缘化这个社会现象，始于文革，终于当下，需要一种大跨度的从文革到改革、再从改革到后改革的研究。另一方面，笔者以为，不宜就事论事地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应当把它放到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演变的大背景中比较分析。因此，本文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所涉内容的地理跨度和知识跨度也大：既讨论中国，也对比俄国、中欧；既分析经济基础的变化，也研究上层建筑的固滞。笔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发现了一个至今被官方钦定的研究禁区，即国企私有化真相，而这个真相恰恰就是理解本文内容的关键点。

笔者在本文中，首先简单介绍从文革到改革初期的国企体制及其价值观惯性，这是理解原国企职工怀旧情绪的基础；然后说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三种模式，由此提出价值观转型的重要意义；接下来解释一种最近形成的制度架构，即中国90年代后期的国企私有化政策如何造就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而工人阶级正是在此过程中失去一切的；本文最后所分析的是，为什么共产党资本主义这种体制架构内含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根本矛盾，而这种矛盾如何使中国的改革和改革话语失去了生命力，但原国企职工的怀旧情绪反而因此获得了正当性。

◇ 当家做主到厂内民主

共产党建政后都致力于消灭私有制，然后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基础；与此对应的政治教条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但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都是党委或厂长管理下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可能受到尊重，但并没有真正的领导权。唯独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达到了共产党阵营各国的最高境界，在许多单位里他们成了真的领导。普通工人被授予政治权力，虽然仅限于一小部分人，但他们取代各机构的“当权派”这一象征意义，似乎真正落实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宣传口号，因为他们当时不仅可以在所派驻机构里当家，而且可以“作”许多共产党干部的“主”。虽然这一短暂的辉煌很快就结束了，毛泽东死后，“文革”被否定，工人们不但恢复了以往的被管理地位，而且在80年代的企业改革中成了改革的对象，但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这一口号依然被官方坚持，国企工人的价值观也仍然建立在这一意识形态口号的基础之上，他们相信，即使开始了企业改革，自己的既得利益还是受共产党体制保护的。

李逊对上海文革史的研究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文革实践为毛泽东巩固文革成果提供了样板、开辟了道路，“上海帮”从此获得了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注1）1968年8月毛泽东向各地大中小学派出工宣队，8月25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社论，从此，工人阶级不再是名义上当家作主，而是实质上成了“领导阶级”，国企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员成了各地学校和文化机构“领导小组”的核心成员。此文一出，“整个工人阶层为之振奋，作为工人阶级参与文革的榜样的上海工人造反派，更将此看作是毛泽东对他们的莫大信任和支持”。（注2）可以说，以工宣队为标志，工人阶级的成员正式走上了行使政治权力的舞台，而他们的最高代表就是一度被毛泽东提拔重用的王洪文。在共产党国家，许多干部努力一生，无非是为了往上爬、获得更高的权力，而毛泽东却让中国的许多普通工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这样的权力。对这种工人阶级“主人翁”价值观与政治现实的独特结合，很少有工人阶级的成员会表示反感。

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通常受到国有经济体系的保护，而中国的国营企业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有很大不同，它具有支撑极权体制的重要社会政治功能。国营企业除从事生产活动以外，还必须包办员工的从托儿所到养老丧葬的几乎一切的社会福利需要。政府对城市民众的福利许诺是通过每个企事业“单位”实现的，社会福利涵盖了吃、

穿、用、住、行、医等诸多方面，其结果是造成了员工对“单位”的依赖性，而国家因此得以通过“单位”控制员工，员工在“单位”内只有通过服从作为代价，才能换取资源、利益和机会。与此同时，由于国营企业具有福利功能，就不可能按照单纯利润目标经营。中国政府明知“企业办社会”体制之弊，却长期维持着这一体制。对国企员工来说，虽然文革时期工资长期冻结，但这种稳定的经济状态已属当时社会各阶层当中的翘楚。文革时期，农民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形同农奴，机关干部、大学教师和文化单位员工要到干校务农，而国企职工稳定的生活和基本生活品供应，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其他阶层的羡慕对象。至于上海，更因其商品供应丰富而优质，成为全国倾心向往之地，上海的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倍感满足，形成了领先全国的充分优越感。

◇ 工人地位大起大落

从70年代末开始，“革命”的意识形态已失去社会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经济现代化实现小康生活”的政策许诺。政府通过提高国企职工收入、增加福利，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但导致国营企业的财务状况逐渐恶化。从1986年开始，仿照农村改革的模式，在国营企业里广泛推行了由厂长经理承包的改革试验，但效果有限。国企职工认同官方意识形态所鼓吹的“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和“职工监督领导的企业民主制度建设”，但对这些口号能否落实十分困惑；另一方面，很多职工出工不出力。（注3）1988年春中国模仿苏联，颁布了《企业法》，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工会为其执行机构。（注4）这个法律虽然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但进一步肯定了共产党意识形态里关于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企业民主监督等理念，与戈尔巴乔夫的《企业法》异曲同工。显然，在上世纪的80年代，虽然工人阶级不再“领导一切”，但当时的企业改革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厂内民主”理念。从有效的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厂内民主”从来就无法真正实行；但是，中、苏两国秉承意识形态教条、坚持“厂内民主”这一理念的客观结果是，它深深地塑形了国企职工的价值观，而这样的价值观在后来中国和俄国的私有化过程中都直接影响了工人们对于私有化过程的评价。从1992年的一项中国职工状况调查中可以发现，将近70%的职工表达出“应该争取民主管理的权利”这样的价值判断。（注5）

那么，国企职工如何看待他们的企业领导呢？1997年夏，在中国的私有化开始之前，全国总工会组织了一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注6）这次大规模调查从企业层面揭示了中国大部分企业管理者素质低下的问题，大约三分之二的职工表达了对管理者的不满。例如，12%的职工认为，“主管部门用人不当”；7%的职工认为，“经营者素质差”；9%的职工认为，“经营者决策失当”；27%的职工认为，经营者未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还有7%的职工认为，经营者导致企业“内部分配不公”。（注7）由此可见，当局重用的红色企业管理精英往往得不到职工们的充分信任，其中许多管理者本来应该被下岗；但是，中国的经济转型却让这样一群管理者几乎无偿地占有了国有企业，对依然持有“当家做主”信念的原国企职工来说，这种转型的正当性大可质疑。

从1949年到1996年这将近50年时间里，中国工人阶级经历了从“当家做主”到“领导一切”，再从“领导一切”回归“厂内民主”这样的历史演变，其中，既有大起大落，也有淡定不变。大起大落的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而淡定不变的是工人阶级的基本经济地位和所谓的“厂内主人翁地位”。如果说，今天原国企工人的怀旧有一个历史参照系的话，那么，这种50年不变的工人阶级的基本经济地位和“厂内主人翁地位”，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参照物；而他们判断后来历史变迁的种种是非曲直，就是从这种价值观出发的。

◇ 或是主角或是牺牲品

20世纪最后20年共产党阵营各国的主题词是“变革”。在此过程中，各国工人阶级，或者成为主角，或者成为牺牲品；很不幸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是后者。

全世界采用苏联模式的制度，其生命力都是短暂的；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或早或晚都会走上转型的道路。所谓制度转型，就是告别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国家”和经济上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体制。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学者只谈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笔者想强调的是，在这两个层面以外，还有一个通常被人们忽略的基本问题，那就是，要顺利完成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型，除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之外，还有一个转型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最艰难的，这便是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社会转型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指的是全社会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如果一个共产党国家走上了政治、经济全面转型的道路，那么，人们在共产党时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都必须相应地调整、改变。在中国、俄国这样共产党的洗脑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制度变革是政府的责任，却很少想到，每个公民自身有什么责任，或者每个公民在转型期间的思维和行为是促进转型，还是阻碍转型。笔者认为，政治、经济的转型能否真正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转型，也就是取决于适应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的重建。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转型的轨迹不一定是朝着令人乐观的方向移动的，它也可能逆向移动，即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变得越来越坏，中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显然，完整的制度转型应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缺一不可。逻辑上转型至少可能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第二种，实行了政治、经济转型，但社会转型迟缓；第三种，实行了经济转型，但未实行政治转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现社会转型。也可以说，共产党国家的转型可以区分为完整的制度转型、没有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转型、和没有政治、社会转型的经济转型：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的转型都属于完整的制度转型，笔者把它们称作中欧模式；俄国的转型属于没有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转型；而中国的转型则是没有政治、社会转型的经济转型模式的代表。

如果比较中欧、俄国、中国三种模式的社会后果，可以发现：在中欧模式下，原来的共产党精英多半未能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大概三分之一的原来的共产党精英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注8）；俄国模式的结果是，共产党制度失败的责任被推给已经消失的前苏联政权，在转型过程当中，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后他们开始分享转型当中的好处，从中发横财，同时老百姓也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一部分产权；而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当局虽然把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等，全都抛弃了，但它继承了毛泽东留下来的政治制度和权力体系，同时，当局要求国企的工人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付出代价，而这些企业的经理们却“空手套白狼”，成了新的资本家。

◇ 透明、参与、公正

那么，在这三种模式当中，中国模式具有优越性吗？笔者认为，评价转型模式的好坏，有三个标准，即透明、参与、公正。第一条标准指的是，改革的过程是否透明，是对社会大众公开，还是掌权者的黑箱作业。第二条标准指的是，谁能参与这场改革，是一小撮权贵，还是社会大众，有什么理由不让“国家的主人”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主人们”参与讨论呢？第三条标准指的是，改革的结果是否公正。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笔者认为，毫无疑问，中欧模式比中国模式好得多，在中欧国家，转型决策比较透明，社会各阶层能充分参与转型过程，转型的结果比较符合社会公正的要求；而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决策是黑箱作业，

公众不但不能参与，还必须为腐败的政治经济精英“买单”，甚至为了让他们暴富而下岗失业。关于中国模式和俄国模式的比较，中国官方有两个说法深入人心。其一是，俄国只搞政改，不搞经改；其二是，俄国实行的是震荡疗法，而不采用中国的渐进策略。这两个说法都违反事实，都是错的。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其实推动了经济改革，在工业企业改革方面的做法和中国是一样的；其结果也和中国一样，即苏联的国企改革和中国一直到1997年以前的国企改革同样都未能成功。另一方面，中国和俄国同样实行了包括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的震荡疗法；不同之处在于，对俄国老百姓来说，震荡疗法的相关政策基本上是透明的，他们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中国老百姓则完全被蒙在鼓里。实际上，俄国模式比中国模式要好一些，虽然两国都出现了红色精英的腐败，但毕竟俄国的经济转型是在民主化过程当中实施的，因此，基本上是透明的，允许公众参与，并且结果的公正性大大好于中国。

对中、俄两国来说，中欧模式是无法复制的，原因就在于社会转型的障碍。今天，人们谈到俄国的民主化，往往会提起普金的威权统治和高票当选，这个现象就是社会转型迟滞的必然结果。中欧国家能够快速完成社会转型，是因为苏联模式是苏联用武力移植进去的，一旦告别苏联模式，清除外国（即苏联）势力输入的价值观就比较容易。而俄国和中国一样，是共产党革命的摇篮国，在这样的国家里，共产党建立的价值观是本国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社会成员个人历史、家族历史的一部分，人们可以抽象地批判这样的价值观念，却难以否定个人、家族、国家的历史。国企工人对旧时代的怀旧，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在俄国也一样。笔者在俄国研究过转型时期的大量民意调查数据，也做过很多访谈，发现这种对旧时代的怀念，不但普遍存在，而且持久不衰。但是，中国原国企工人的怀旧，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私有化比俄国的更充分地表现出掌权者的无情掠夺，而对这种行为，官方意识形态无法为之辩护，只能加以掩盖。

◇ 经济转型对工人的背叛

在中国的官方宣传里，通常把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视为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其实，如果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式走向寿终正寝的准确时间点是1997年。从1997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制度正式转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因为，中国的私有化起始于这一年；而中国工人阶级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彻底地失去了一切，他们不再是名义上的“主人”，也失去了过去50年基本稳定的经济地位，甚至他们下岗时，连过去政府关于国家会包“生老病死”的承诺也一风吹了。

在中国的正式话语里并没有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的用语；取而代之的是“改制”和“市场化”，这两个词都是对过程的简单描述，但回避或者模糊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解体的，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当然，中国政府这样模糊转型的实质，自然有其苦衷。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便是绝大多数企业的国有制；而要改变现有企业的国有制，唯一的选择就是私有制。一旦现有企业的大多数都私有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彻底解体了；而以企业私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所以，在转型国家，经济制度的转型必然要经过私有化这一阶段，而私有化过程本身就是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但是，不同的私有化方法会建设出不同的资本主义，中欧国家的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是一条道路，而中国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则是另一条道路。

改革启动以后，国营企业长期依赖银行“输血”度日，而银行向国有部门倾注的资金越多，自身的经营状况就越恶化。从90年代中期开始，整个银行系统的潜在金融危机日益暴露。90年代初，4大国有银行20%以上的贷款属于坏帐；1994年全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注9）；到了1996年，银行系统的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

款已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注10〕。为了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1997年下半年，政府决定全面推行国企私有化，把十多万家国有工业企业当中的大多数作为“包袱”而甩掉。在私有化政策推行过程中，中共采用了一个含义暧昧的词汇“改制”，但拒不说明，国有企业将被改变成什么样的所有制。“改制”之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终于在中国寿终正寝了，而它的掘墓人就是它的缔造者。然而，中国政府至今仍然宣称，它从来“不搞私有化”。

由于政府和国内媒体掩盖真相，所以至今许多从未在国有企业工作过的人仍然不了解何谓“国企改制”。其实，所谓的“改制”，就是让中小企业私有化，同时让大型国企上市，实行部分私有化。当局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就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身上，而政府则置身事外。当然，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也不会白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中国的私有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四年左右。其结果是，大部分企业被私有化到厂长、书记的口袋里，多数人凭藉他们在国有企业内的权力和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用企业的资金为他们个人购买企业的产权。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其手段包括上市、管理层持股、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等。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是11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2万家，其中还包括已经实行部分股份化、但国家仍然居于控股地位的企业。

◇ 中国不许研究私有化过程

私有化的关键是谁来购买。中国与俄罗斯一样，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满足收购企业所需要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需要；外资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企厂长经理们能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其实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为这重重黑幕，所以中国政府一直不许国内研究者研究私有化过程，媒体也基本上不报导国企私有化的真相。中国政府准许境外的研究人员对国企私有化进行调查，以便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私有化进展状况的数据，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铺路；但是这些调查结果不准在国内出版，国内媒体也不许介绍。从几次境外研究人员调查的结果来看，中国私有化的工业企业当中，大约60%成为厂长经理的囊中之物。这些“买下”国有企业的新红色资本家自己不可能有几千万资金，他们通常都是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或向私人借款，用这些借来的款项把企业买下来，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然后再动用企业的资金去偿还购买企业产权的债务。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标准的侵吞公有资产。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私有化过程当中是非常普遍的。（注11）

如果把俄罗斯和中国的工业企业私有化的过程和结果作对比，有以下几个明显的不同。第一，俄国政府有统一的私有化方案，由工人们投票决定选择哪一种；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明确宣布过企业改制的具体设想，企业的私有化方案是政府官员和厂长经理在密室里策划，然后黑箱作业，一般不让工人了解实情。更恶劣的是，在中小国企私有化期间，中国的国务院关闭了唯一的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門，从而为地方政府和国企经理上下其手提供便利。第二，俄国的厂长、经理在私有化过程中对工人的意愿比较尊重，所以很少因私有化而发生劳资冲突；但在中国，从1997年到2005年，全国到处都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根源都是厂长、经理通过私有化侵吞公有资产，而政府基本上都站在厂长、经理一边，帮着他们侵吞，因为政府官员从中也可以得到好处。第三，俄国工人入股基本上是自愿的，用的是政府发的私有化券，入股之后他们的股东身份能够得到承认；而中国的很多工

人则是被厂长、经理威胁着强迫入股，只能用个人储蓄，但入股本厂之后，其股东身份常常得不到承认，甚至经理偷偷把企业卖给第三方、拿钱溜号，工人股东也毫不知情。第四，在俄国，企业职工持有的本企业股份大约占40%左右，比中国工人的10%多得多；俄国的企业经理层虽然也持有一部分股份，但比中国的经理阶层少得多，因此俄国的厂长经理靠他们个人控制的股份，往往无法把企业变成他私人的，因为工人也拥有大量股权。第五，私有化之后，俄国工人敢于讲真话，笔者在俄罗斯工厂做过大量调查，许多俄国工人敢直言不讳地指责他们的厂长、经理贪污腐败、滥用特权、无能；中国在私有化之后，工人的地位急剧下降，有的企业甚至对工人实行军事化管理，即把工人当奴隶对待，特别是在山东的一些煤矿，而山东省政府却把军事化管理当做企业文化的样板加以推广。第六，俄国私有化过程中解雇现象较少发生；而在中国，强迫工人下岗待业，是厂长、经理普遍运用的降低企业收购成本的手段，而且这个做法得到了政府的充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仍然正常运转，少数失业工人可以领取社会福利而勉强生存；但中国推行私有化的时候，原来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福利体系已经垮了，许多企业给工人很少一点钱，把他们赶走，就死活不问，私有化时期中国大量的劳资冲突就是这样发生的。第七，从上面各方面可以看出，在私有化过程中，中国政府在对待国有企业工人的问题上，远不如俄罗斯政府那么善良。当时，中国政府广泛宣传，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是为改革作出牺牲，是必要的；但政府却不愿意为下岗职工建立统一的失业救济，而是把这项支出甩给私有化之后的红色老板，如果企业的新老板不想付，政府也不管。其实，如果国有企业私有化了，企业付不起社会福利开支，政府对原本为国家职工的下岗人员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当时采取了耍赖的态度。而俄国政府从未推行过强制下岗之类的政策，相反，还用税收优惠鼓励企业保留职工岗位。

比起中欧国家和俄国的私有化，中国的私有化是最不公正的，也最冷酷无情。显然，专制政体下的经济转型可以罔顾社会公正而不必担心选举压力，对权贵精英来讲，这样的模式自然是优越的；但普通民众的评价恐怕恰恰相反。尤其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其意识形态，强调依靠工人阶级；但它的私有化政策充分表明，政府已经彻底背叛了它的意识形态话语，当然也背叛了工人阶级。

◇ 文革不死的制度根源

1988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过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讨论会。在那次会议上，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一位经济学家表示，在他看来，所谓的社会主义，无非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先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然后再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一年以后，这位匈牙利学者的断言就被苏联东欧共产党阵营的解体和转型的结果所证实。然而，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回归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一定是历史的终结；相反，这一回归如果走歪了，就像在中国那样，它意味着一系列新的矛盾的隐伏乃至爆发。

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转型一旦开始，共产党精英试图窃国自肥，乃是通例；但是，这种局面并非不可避免。共产党精英染指经济转型过程的现象，在中欧四国（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便受到了明显的遏制。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欧国家的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他们的主张不是与原共产党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化的残余。在中欧国家许多民众的眼里，共产党政权是外国扶植的傀儡政权。所以，从50年代到60年代，每个中欧国家都发生过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被苏联红军镇压下去了，但反抗意识始终存在。这些国家的异议知识分子认为，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是直接关联的。因此，80年代末苏联阵营解体之时，维护民族尊严、国家独立和去共产党化就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了。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社会气氛里，中欧国家的前共

产党精英无法像中国或俄国的共产党精英那样为所欲为，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既不能操纵议会，也无法通过私有化发财。这就是中欧国家的转型能成为天鹅绒革命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关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中有一种看法以为，经济自由化之后，原来的共产党红色精英会自然地拥抱民主和自由。而中国的转型结果证明，这种想法不但幼稚，而且可能是错误的。中共出于对下台的恐惧，镇压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1997年，出于对国有企业拖垮国有银行系统的恐惧，当局又推行了全面私有化。自从中国开始经济制度的转型之后，已经20年了，从经济制度来看，中国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孕育出民主化的萌芽。为什么在中国看不到中欧国家近30年前发生的那种天鹅绒革命的希望？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经济转型产生了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制度异端：共产党资本主义。中国的红色精英变成资本家之后，他们不但敌视民主制度，而且认为，共产党的专制才是他们唯一的安全保障。现在看来，中国的这种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正帮助和强化红色资产阶级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所以可以说，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拯救共产党政权。

◇ 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中国模式提出了一个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以前未曾重视的问题：经济转型是有利于政治转型，还是阻滞政治转型，其关键在于两者的先后顺序。换言之，当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同步的时候，比如俄国的情形，由红色精英“变身”而来的民主派不会反对民主化，因为他们发现，民主化的过程并不见得会妨碍他们利用以往的社会关系致富；但是，如果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启动之前便已完成，例如中国的情形，已经成为资本家的红色精英会强力阻止民主化，对他们来说，民主化不仅会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同样可能会追索他们非法获取的财富。所以，红色资产阶级比保守的老共产党人更仇恨民主化，因为，保守的老共产党人在民主化过程中失去的主要是共产主义理想，而红色资产阶级却可能失去财富，甚至生命。当这个国家的大批企业和财富掌握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红色资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对红色资本家来说，唯一可以信赖的自我保护制度，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法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他们对全社会其它成员的永久型专政。他们很清楚，国家社会主义那套经济制度丝毫不值得留恋，现在他们不但拥有比民主国家的企业家更容易获得的财富，也拥有无需竞争的优越政治地位，还可以阻止民主化可能造成的政治、经济清算。所以，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他们希望永远保留下去的“红色江山万年长”。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很明显，在共产党政权之下，这种红色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

今天，马克思的肖像之所以仍然立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因为他能为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身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维持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解释。吊诡的是，中国模式本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中共生存下去的诀窍就在于，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和招牌，建设和巩固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模式既挑战了马克思主义，也挑战了民主化理论。

1989年初，邀请笔者访德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安排几位访问学者参观位于特里尔的马克思故乡。当时留言簿上有人用中文写下如下文字：“老马啊，你可把咱害惨了。”现在看来，此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马克思也被中国模式害惨了。如果让马克思今天来评价共产党资本主义，他可能既恼怒又欣慰：恼怒的是，共产党人居然要靠“嫁”给自己的敌人资本主义，才能存活下去，这是对他的理论和主义的最大讽刺；而欣慰的是，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总算还有个别机会主义的共产党政权依然活着，证明马克思也不是一无成就。但是，假如面对大英图书馆里的书架，马克思仍然无法摆脱一个巨大的困惑：他的理论的基本框架奠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先进的生产力必然改变

落后的上层建筑；但是，中国模式却逼着马克思不得不彻底推翻他的核心理论概念，从而也推翻整个马克思主义。从共产党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来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上层建筑其实是依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维系下去的；那么，这个上层建筑究竟属于已经消失了的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残余，因此即将被历史淘汰，还是因其“先进”性，将必然孕育出又一次铲除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新共产主义革命？或者，为了从中国模式里吸取教训，马克思必须把他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说，改成“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不仅对马克思来说，几乎是天问；而且对中共来说，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危机。笔者在2009年的“发展的困境：社会不公的逻辑结果”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共产党执政后前后两个30年的政绩事实上相互否定这个观察（注12），这不过是对上述天问的初步思考而已。当笔者此文被人冒名在互联网上传播时，中共领导人也明确表示，不可以用两个30年互相否定；但是，这是行政命令，并不能解答这个天问。

在这个天问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资本主义之下中共的意识形态危机，特别是国企私有化之后的改革作为与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尖锐对立，常常让传统意识形态的卫士们找到议论空间，而原国企工人们对方文革时代的怀念，恰恰就是这一矛盾的必然产物。这个意识形态危机的最典型表现是，改革话语从非意识形态化向“理论”虚化转变，从实用主义的邓理论，到三个代表说，再到科学发展观，逐渐偏离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和讨论，使得一个以制度优越论为逻辑起点的意识形态，最后只能在民族主义话语里寻找正当性。然而，民族主义话语在意识形态空间里是如此单薄，以致于毛泽东时代话语的跃动，似乎总能产生相当的解释力度。旧意识形态的危险性还主要不是它能为怀旧情绪提供正当性，而是它可能引导出对红色暴力革命的再度关注。在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制度架构下，虽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有其自稳定性，但旧意识形态的活力却为社会潜流当中的“批判的武器”提供了养分。如此看来，中国未来的政治演变并非只有民主化一种可能，旧的上层建筑里，为专政注释正当性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时时刻刻在培养着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潜在反对者。如果要阻止私有化之后进入企业的新工人阶级从《共产党宣言》里寻找自己的话语，宣称“信奉”马列主义的共产党，是否也要禁读马克思起草的这篇各国共产党的看家文献呢？

（程晓农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独立学者）

注释：

1，李逊，《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2015，电子版。

2，同上，第29章，第5页。

3，“企业职工工作积极性调查组”编写，《厂情·人情·心情——中国职工心理大调查》，海洋出版社，1991年。据中国社科院等机构1987年在21个大中城市47家企业的随机抽样调查（共1·5万份问卷），只有12%的人在在工作中百分之百地出力，47%的人出力八成，30%的出力六成，9%的人出力四成，3%的人只出两成力。该书第3页。

4，《人民日报》，1988年4月16日。

5，冯同庆、许晓军编，《中国职工状况：内部结构及相互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80页。此次调查由中国工运学院于1991—1992年在10个城市的100家企业中实施（共8419份问卷）。

6，这次调查由全国总工会政研室设计，在15个省的81个市县的2,335个基层单位中，通过随机抽样方法，对5·4万职工实行了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等。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1997：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数据卷》，西苑出版社，1999年，第1861页。

- 7, 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1997: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数据卷》,西苑出版社,1999年,第1575—1576页。
- 8, Gil Eya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New Ruling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8.
- 9, 翁杰明等编,《1995—1996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57页。
- 10, 田汉卿、孙礼照,“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盈利性比较分析”,《管理世界》,1994年第6期,第102页。
- 11, Xiaonong Cheng, “Capitalism Making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ransition: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China’s Communist Capitalism”, in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 New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2, 程晓农,“发展的困境:社会不公的逻辑结果”,美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3期,4—16页。因此刊遭到刻意破坏,笔者不得不自该期起辞去主编职务,该刊从这一期起再未在国内流通。

□ 原载《新史记》2016年总第33期

~~~~~  
【往事非烟】

我参与了北师大大的“九·七事件”

• 林贤光 •

1967年的9月,我正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第三动态组(分工负责北京动态,简称“三动”)中担任动态员,也就是每天出去到我联系的一些单位,将无论是大道消息还是小道消息统统搜集起来,带回动态组汇总分析,提供井冈山总部作为形势分析和制定战略的参考。同时,油印出版“动态报”发给基层战斗组,交换到校外。

那时,北京社会上已经明确地分成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北大“新北大公社”为中心的“天派”(北大反“地派”,但一般不大参加北航和清华的反“地派”活动)和以地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为核心的“地派”,在社会上互争地盘,互挖墙角,斗得不可开交。

我那时是负责文艺院校和一部分社会动态,正在关心当时社会上才出现的“5·16”反周总理现象,涉及学部以及学部和地派的关系。

8月份,在武汉“7·20”事件之后,一时得意非凡的王力,到了8月下旬与关锋一同被抛出来。随之,经手炮制反军社论的林杰也被揪了出来。这使得天地两派的明争暗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因为,天派这边认为林杰和学部的吴传启是地派的“黑后台”。由于林杰和谭厚兰是校友,而且在“文革”期间又有紧密的联系,加以林杰的特殊身份(《红旗》杂志社编辑),我们就认定林杰是谭厚兰的后台。1967年8月林杰一被揪出,天派中的许多头面人物就认为:这样一来,师大谭厚兰的“井冈山”必垮。9月初,谭厚兰又以个人名义在《红旗》杂志社贴出大字报为林杰翻案。更加加重了天派认为谭厚兰在和“中央文革”唱反调。〔1〕

9月初的几天，“三动”加强了对师大的动态收集。我也到师大去看大字报，不过也只是般动态而已，一个苗头就是师大反谭厚兰的“井冈山造反兵团”似乎恢复了活动。

9月5日的晚上，“三动”开会时，就有人传来消息说：“师大革委会造反了。”第二天就有人把师大的大字报抄了回来，是师大的革委会成员樊立耀、黄家林贴出大字报造谭厚兰的反。

9月6日晚上，突然轻工“红鹰”的头头朱成和作战部长王启凤来到“三动”的乙所，问天派的头头会在哪里开？不久，机院的作战部部长轰雷和人大“三红”、体院“兵团”都来了，“三动”的负责人张树有也来了。一起去了“井冈山”团派的总部工字厅后厅，等了一下，无人知道。后来人大说，是否改到北航去开了。赶快打电话去问，果然会议改到北航了，说：赶快大家都到北航去。还说：清华再去几个人。于是，体院、人大等校都开了车去了。清华则由王其林、张树有和我骑了自行车赶到北航去。到北航之后，有人把我们带进了教学区（北航的教学区是禁区，有军队保卫，不是北航的人不能进去），到了一个很大的教室，里面大约坐了有50到60人，围了一个大圆圈，中间是发言的人。蒯大富和韩爱晶都坐在中间。清华“井冈山”除了我们以外，还有管后勤的常燕群。

我们到的时候会议已经开了一半，记得我进去时是一个女的在讲话。我问了坐在我旁边的北航红旗的作战部长刘德威，才知道发言人是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头头王颂平，他们另一个头头叫铁崇光。另外，师大革委会中造反贴大字报的樊立耀、黄家林、李五全也在。我的印象是王颂平正在发言，内容好像是对樊立耀他们的造反表示不信任，认为他们和林杰本来就是一伙的。不相信他们是真造反，不愿意和他们合作。而蒯大富和韩爱晶都建议他们两家合作，至少在反对林杰这个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把明天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大会开好。让樊立耀回去把明天用的广播器材等设备准备好。随后樊立耀等三个人就先走了，这边接着开会。

似乎是一切都已经商量好了。第二天要在师大开“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大会。蒯大富统一了口径，叫做“打倒5·16集团，打倒林杰，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口号要喊“谭厚兰悬崖勒马”，不要喊“打倒谭厚兰”。这样大会不会被人揪住辫子。又有人提出：“只怕地派来冲会场引起武斗”，于是决定，各校都多去人，纪律一定要好。体院刘长信说：他让运动系的人提前进场保卫主席台。后来不知谁又提出，最好天派集合起来一起进场，这样声势浩大，又可保持良好的纪律。最后，北航刘德威总结了几条：1.各校尽量多发动人去，2.遵守纪律，3.明天早晨都到北航南操场集合一起去师大。而且决定了由清华的鲍长康代表天派发言，由清华拟发言稿，原因是鲍长康在清华9月1日已经对林杰的问题发表过一次影响比较大的讲话，而且派性十足。韩爱晶说：“就让他再表演一次吧。”

记得蒯大富说他也想到师大去，韩爱晶说：“你别露面，留一步，我（指韩自己）认识的人少，在底下转转没什么，你不要去，找个离师大近的地方，设个前线指挥部，有人给你通风报信就行了。”当时。刘德威就提出，把老蒯坐镇的地方设在电影学院，那里离师大近，又是天派的“井冈山”掌权。蒯大富也同意了，在那里当不露面的指挥。

对师大“造反兵团”大会的具体工作也分了工，北航送一面“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大旗，清华为大会作一个横幅，装一辆广播车。参加大会的人数，蒯大富说：“我半小时就可以调动三千人。”韩爱晶说：“北航去两个系。”还说：今晚一定要通知那些没有参加今晚会的学校明天去参加师大的会。最后又一再问师大的王颂平还需要什么，韩嘱咐王要把明天的发言准备好，把人组织好。那时，北师大的“井冈山造反兵团”大约不到一百人。然后，各校分头回去组织力量，蒯大富派车送王颂平回师大去。散会之后，蒯大富把我们三个

人留下，问“明天谁跟我去电影学院？”张树有就推荐我，说我去最合适，搞文艺口，和电影学院的“井冈山”也熟。蒯也同意了。进一步分工，张树有负责回去通知其他学校，王其林回去组织人连夜做横幅装广播车，找鲍长康准备发言。蒯大富告诉我，明天一早6点钟在静斋门前上车。这样我们三个大约半夜1点钟回到学校，我回宿舍睡觉了。

9月7日早晨6点钟，全校的高音喇叭就大声喊叫，组织兵团的人去师大。我则到了静斋和蒯大富坐车去电影学院（新街口豁口外小西天路西），常燕群开了一辆三轮摩托跟在后面。先到了北航的红旗院，时间尚早，蒯就让我 and 常燕群先到师大去看看。我坐了常的摩托就去了师大，从前门进后门出走了一趟。觉得情况很好，“造反兵团”在大门处摆了签到处，校内大字报很多，几乎都是揪林杰、揪谭厚兰和批判谭厚兰的大字报，还有不少从“井冈山”造反出来要求参加“造反兵团”的表态大字报，而且听到今天早上师大广播台造了反。我看了觉得形势简直好得不得了，赶紧回到北航向蒯和韩汇报。

于是，蒯大富和刘德威带了我 and 常燕群去到电影学院，我去把电影学院“井冈山”的头头居联贵找出来。居听到蒯和刘来了非常高兴，并说他们立刻装一辆广播车去参加师大的会。

7点多钟，有人从师大来，说：师大有人抓起了谭厚兰，要批斗她，但不知是谁抓的，反正不是“造反兵团”抓的。蒯大富和刘德威听了都急了，说“抓不得，斗不得”，赶快去看看。于是，刘德威拉上我就赶到师大去，在宿舍找到了“造反兵团”的王颂平。王说：“樊立耀今天早上突然搞了一个‘专政委员会’，把谭厚兰抓了起来，还说这个‘专政委员会’里面有‘造反兵团’参加，但是，我们不承认我们参加了。”我们问：“现在谭厚兰在哪里？”王说：“现在谭保护在我的宿舍里。”刘德威说：“赶快放了，否则他们会造谣说你们扣了谭厚兰。”于是，王颂平立刻派人去把谭厚兰放了。

在师大操场上正在布置会场，清华的王其林、王文鼎、李国柱都在忙，鲍长康也到了。但大队人马还未到，我又和体院的同学坐了车去看大队走到哪里了。沿途迎上去，在土城附近看到了庞大的队伍正在走过来，几个学校的天派队伍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后来说是有上万人参加。我还说，这一回是个“天派队伍大检阅”。

等到大队进了师大，到了操场，韩爱晶、朱成、刘长信等人都到了。韩爱晶派了北航的车到电影学院把蒯大富也接过来。大会开得很顺利，到中午就结束了。我印象在师大操场遇见地质学院的田春林和王大来，他们在找蒯大富。我带了他们去见了蒯和韩，他们一起又到电影学院去谈话了。我未参加，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当晚我在“三动”就听到了消息。当天下午，北京卫戍区的李钟奇司令员到师大去了，宣布：“开万人大会斗谭厚兰是错误的”，并宣布将樊立耀、黄家林、李五全等三人拘留审查。当天，“中央文革”批评了蒯大富和韩爱晶，不应当颠覆师大的革命委员会。

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北师大的“九·七事件”。事后，谭厚兰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重新执掌师大的大权。而“造反兵团”和被关押的樊立耀等人后来的遭遇如何，由于断了联系我就不清楚了。

当时，我对李钟奇在师大宣布的决定有意见，我认为：在师大开万人大会是“造反兵团”恢复活动，这和斗谭厚兰是两回事，不应当扯到一起。

这一次，天派借着8月底“中央文革”中王力、关锋被揪出来，穆欣被逐回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社又揪出了林杰，谭厚兰十分被动之际，企图颠覆谭厚兰和师大革委会。派性的大

发作是前所未有的，认为时机对天派有利，准备一举给地派一个重创。在“九·七事件”中，天派全力投入，但最后还是“中央文革”说了算，谭厚兰被保了下来。我们这一大批人瞎折腾了一阵，最后天派、地派谁也没赢。只有把我们这些人玩弄于手掌之中的幕后的如来佛一举定音，让我们双方都灰溜溜地。天派想翘尾巴也没翘起来，地派由于林杰被揪出，谭厚兰受到重创，尾巴也被割掉了一段。两败俱伤，没有胜利者。

我参与北师大“九七事件”，虽然只有三四天，但还是起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起了不好的影响。是我在“文革”十年所犯大小错误中对校外影响较大的一个，是我应当向北师大文革期间的广大师生深表忏悔、致歉的一件事。

应当说，我对师大还是充满了感情的。我从师大二附小毕业，又在辅仁男中上了六年学。北师大有我敬爱的恩师朱鼎勋、郭预衡、尹敬坊等，还有我的小学、中学的同班同学任教。我到了清华之后，1954年还到北师大旁听了朱鼎勋先生的“射影几何”课程。可是在我参与“九七事件”的那几天里完全没有想到这些，鬼迷心窍一样掉在派仗的漩涡中间，一心只想“揪后台”“抓黑手”，挤垮对方。这个“鬼”是什么？就是那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使你忘掉了一切，什么亲情、友谊、文化、历史全然不顾。这是我应当终生引以为戒的教训。在今天，“文革”似有死灰复燃之势，对于未经历那场“浩劫”的年轻朋友来说，实在要提高警惕吸取教训。我已是年近九旬的老人，有望于来者，不要再重蹈我们走过的弯路，所望也不过如此。而对于国家的命运来说，则希望那一场“浩劫”万万不要重演。

再次向北师大的老师和同学们致歉，并致以最深沉的忏悔之意。

注释：

〔1〕本文参考了邱心伟的《清华“文革”亲历——大事日志》，第261页；聂树人著《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

〔作者简介：林贤光，清华大学退休教授，在“文革”中曾因涉入“陈里宁事件”长期被整，“文革”后宣布无辜。〕

□ 来源：《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黎云编著，（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

【研究报告】

1966—1968年北京大学红卫兵的派系冲突（下）

• 魏昂德 •

〔上接 z k 1 9 0 5 a 〕

八、结论：北大派系之争的本质

北大的派系冲突实质上反映了运动中对抗各方为了反对党的旧领导层而展开的一场竞争。“老左派”在社教运动中曾经是战友，他们共同撰写了“五·二五”大字报，在反对工作组的过程中积极合作，并且在工作组撤出后共享权力，但最终却分裂成了对立的派系。他

们并没有提出对抗的纲领、表达不同的政治观，也没有对现存的政治和社会格局展示出不同的政治取向。只是到了1966年秋季，当聂元梓为了巩固她对红卫兵和校文革的权力控制而采取了诸多措施后，他们才分道扬镳，而当聂指责她的批评者为反革命之后，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强化到无法改变的派性对立地步。聂的权力基础根源于她的那张著名大字报以及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的支持之上。反对派谴责聂排斥异己和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其在组建党组织和批斗工作组的行为上，比那些于1966年秋季造反运动中取得胜利的造反派们更具有“老保”色彩。政治策略和个人品性的不同促进了老左派、党机构、干部、老师和学生团体的分裂。从派系分化的演变过程来看，没有一个派系可以被清晰地界定为“保守派”或“激进派”。通常，这种划分标准建立在对于政治背景、社会地位以及当谈及“干部问题”时所表现出的迥然相异的政治立场之上：对于干部所犯错误的判定应该严厉到何种程度？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否应该官复原职（160）？这一问题似乎与个体在文革前所处的社会地位遥相呼应，并取决于他们与先前当局的关系有多近。1967年初，聂开始重组北大行政机构时，为“革命干部”提供了一个支持并加入其阵营的机会，反聂派此时并没有采取不同的立场，相反，他们与拥聂派展开竞争，争取招募更多的“革命干部”加入井冈山兵团。双方都指责那些宣誓支持对方的干部是“反动的”，而表扬支持本方的干部是“革命的”。在党组织重组上，两派的立场也如此相似。当聂开始重组党组织时，反对派原则上并不反对，他们只是抱怨聂在排斥反对派核心党组成员过程之中，“篡夺了北大党组织”（161）。在两派没有重大政治分歧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学生会根据他们自身的既得利益和政治价值去选择加入哪一方。事实上，尽管北大官方的红卫兵组织起初十分强调新成员的家庭出身，但关于“血统论”的争论从来没有成为划分北大派系的标准，尽管血统论在北京的重点中学和部分学校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指标（162）。

北大派系冲突所体现出的性质在其它组织和地方的斗争中依旧典型吗？显然，从某些角度来看，它远非典型。聂在官方的文革传记里处于一个特殊地位，她在没有领导过一次造反运动的情况下掌控了权力，却又不得不在其它学校造反派成为反对派的时候来保卫她所获得的权力。她与江青和康生保持着紧密联系，从1966至1968年间，江和康不停地插手运动，把聂从政治危机中挽救出来，尽管他们对聂的不满和愤怒与日增多。

文革期间，北大事件所展现出的特性可以说是十分普遍的，只有聂在其中的角色独一无二。最重要的是，派系冲突产生于由造反突然转向夺权和再掌权这一过程中。这种转折点在每一个单位和地区都发生过，整个中国都可以看到派系之间的分裂。另一个普遍的特征则是全城范围内的大联合在组织层面上将造反派领袖拖入冲突之中，并最终导致原本统一的造反阵营出现分裂。“天派”与“地派”正是源自于组织中错综复杂的联盟关系，这有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这些特征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对政治格局不具有明显的立场分歧、以及没有依据自身所处的社会状况采取措施的情况下，派系斗争是如何持续升温并最终演化成暴力对抗的。

注释：

1，见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唐少杰《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载于张华、苏采青所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第二卷，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774—788页）。

2，徐友渔指出这种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派别区分在1967年初造反派内部分化之后就失去了意义。见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

3, 见 Ezra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339-340; Lee, *Politic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p.1-6。

4, 见 Gordon White, “The politics of Hsia-hsiang youth,” *The China Quarterly*, No.59 (1974), pp.491-517; “The politics of demobilized soldiers from liberation to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82 (1980), pp.187-213; Andrew Walder,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party-state structures and patterns of conflict”, in Elizabeth Perry (ed.) *Putting Class in its Place: Worker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pp.167-198。

5, Elizabeth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1997); Andrew Walder, *Chang Ch' un-ch' 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8)。

6,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83 (1980), pp.397-446; Gordon White, *The Politics of Class and Class Origin: The C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nberra: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6)。

7, 促成这一研究所使用到的新资料, 可参见 Joseph W. Esherick,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in Joseph W. Esherick,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28。

8, 穆欣《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经过》,《中共党史资料》,第75辑(2000),166—167页,和王学珍等编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下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40页。

9, 吴溉之,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和长征,参见《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94页。

10, 例如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参见《聂元梓回忆录》,95—99页。

11, 同上,18—19页;《新北大报》,1967年8月30日,第3页。

12,《聂元梓回忆录》,69—71页,74—79页。

13, 北大党史办公室,《北大社教运动的实施经过》,《中共党史资料》第81辑(2002),90—91页。

14，见《北京大学纪事》，614页。这些早期的冲突在1966年9月22和27日的《新北大》、《聂元梓回忆录》，79—89页和杨勋的《心路：良知的命运》（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15—147页中均有描述。

15，《北大社教运动的实施经过》，90—92页。

16，同上，94—95页，和《北京大学纪事》，621—627页。

17，《有关常溪萍同志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一些材料》，华东师范大学战斗队，1966年10月5日，19—39页；《聂元梓回忆录》，88—89页。

18，见《有关常溪萍同志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一些材料》，10—19页。

19，彭真的这些努力在《大字报选（6）》中有详细描述，参见《大字报选（6）》，北京大学工作组办公室，1966年7月1日。

20，聂是自己要求调离的，参见《聂元梓回忆录》89页和100页。

21，同上，8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57页。

22，《北京大学纪事》，642页；《有关常溪萍同志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一些材料》，19—25页。

23，《北京大学纪事》，642页；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百年潮》，第9期（2001），32—38页；同见陈守一《历史是公正的：北大教授忆文革》，《中国研究》第1期（1995），161—184页。

24，见《北京大学纪事》，642页和穆欣《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经过》，167—168页。

25，聂通过她的大姐将信交给了毛的秘书田家英，她的大姐认识田家英，参见《聂元梓回忆录》，88—89页。

26，同上，101—104页，聂与其丈夫经常和安及其情妇玩麻将。

27，同上，111—118页；《北京大学纪事》，642页。最近的研究并不赞同聂在第一张大字报中的角色和是否由曹引发的说法。对现存研究的批判性概述参见刘一皋《从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和小岗“红手印”谈起》，《中共党史资料》，第87辑（2003），144—160页。

28，《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5.25—1966.8.8》，载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一）》，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大字报编，1966年9月20日，43—44页；《聂元梓回忆录》122—128页；以及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

29，《北京大学纪事》，643页。

30，毛写信给康生和陈伯达：“……很显然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在报纸上明确说明。现在我们可以打破北京大学的顽固堡垒了”，《毛泽东1949年以后手稿》，第12卷，62—63页。

31，张承先《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中共党史资料》，第70辑（1999），17—18页。

32，《北京大学纪事》，645和647页以及郭影秋和王俊义《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炎黄春秋》，第128期（2002），145页。

33，见《北京大学纪事》，647—649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4）》，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大字报组编，1967年3月1日，31—34页；《大字报选，增刊（20）之一》，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大字报组编，1966年11月28日，7—11页；以及张承先《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22页。聂反驳上述所引资料中的后两者，否认她曾在工作组担任过任何正式职务，参见《聂元梓回忆录》，145页。

34，对被整肃者和整肃者的详细描述参见《大字报选（20）》，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办公室编，1966年8月14日。

35，《北京大学纪事》，647—648页。

36，同上，645页。

37，同上，645页，和《北大文革大事编年史》，46页。

38，《大字报选（13）》，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办公室编，1966年7月18日，1—64页。也见《大字报选（20）》，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办公室编，1966年8月14日，8—15页。

39，张承先《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28—30页；《北京大学纪事》，645—646页；《北大文革大事编年史》，46—47页；以及陈焕仁《红卫兵日记》（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29—32页。文革初期陈是北大哲学系学生，此书以他当时所记载的详细日记为依据。

40，四人中只有两人是学生，其中一人扯掉了女党委秘书的衣服抚摸她们的胸部，并且强行把手放到她们的裤子上暗中抚摸私处以羞辱她们。《北京大学纪事》，645—646页；张承先《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28—30页。

41，《中央转发北大文革简报（第九号）》，1966年6月20日。

42，张承先没有见到报告，但是曹签名并进行了表扬，参见《北京大学纪事》，636页。张承先认为曹直接表达的是康生的意见，参见《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31页。

43，同上，31页；《北京大学纪事》，646页。

44, 《毛泽东传, 1949—1976 (下)》(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1421—1422页。

45, 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 《当代中国史研究》, 第2期(1997), 59页。毛泽东《毛主席同中央局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 1966年7月21日, 《大字报选(2)》, 大字报选编小组, 1966年12月, 20—21页。

46, 《北京大学纪事》, 649页;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60—61页。7月19日之前聂没有公开表示对工作组的反对意见, 参见《北大文革大事记编年史》, 50页。第一张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出现在7月13日并吸引了广泛注意, 但是在聂主持的系会议上并没有对其加以评论。6月19日聂演讲后向系学生保证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她批判工作组: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54—57页、63页。

47, 同上, 60—61页; 《北京大学纪事》, 648—649页; 张承先《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33—34页; 《北大文革大事编年史》, 49—50页; 以及《大字报选(增刊二)》,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办公室编, 1966年8月1日, 以及《大字报选(增刊三)》, 1966年7月23日。

48,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一辑)》, 1966年10月;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64—67页。

49, 《北京大学纪事》, 649页; 张承先《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37页; 以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第一卷。

50, 《北京大学纪事》, 650页; 张承先《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39—42页; 《北大文革大事编年史》, 51—52页;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69—75页。

5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1)》, 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 1966年。

52, 见《新北大》, 1966年8月22日, 第2页。

53, 《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第一卷; 张承先《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42—43页; 《北京大学纪事》, 650页;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83—88页。

54, 《北京大学纪事》, 650页; 《聂元梓回忆录》, 154—158页。

55,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95—96页。

56, 根据报道, 8月25日到10月6日之间有5人死亡, 同上, 651—652页。

57, 注意这是在毛泽东于8月18日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红卫兵之后, 集会上毛表扬了数周前自发组织的红卫兵团体。《北京大学纪事》, 651页。

58, 《大字报选(1)》, 40—41页。8月24日, 陈伯达访问北大时有人问他, 红卫兵运动应该是“主要地”还是“完全地”由来自“红色”家庭的学生组成, 陈只给了模棱两可的回答: 你们讨论讨论。《参考资料》, 8—75页。

59, 哲学系其他代表是杨克明、孙蓬一和赵正义, 都参加过早期的批斗运动。《新北大》, 1966年9月13日, 第2页。

60, 44名委员会成员中, 12名来自工作组, 18人是由工作组任命的院系领导, 29人是经工作组证明可以信赖的。14名常委中有10人积极支持工作组, 参见《新北大报》, 1967年11月5日, 第3页。

61, 见 Andrew Walder,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Social interpretations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1 (2002), pp.437-471。

62, 《北京大学纪事》, 652页; 同见《新北大》, 1966年9月13日, 第3页。

63, 超过半数的教授和80%以上的中上层干部的家庭都遭到了红卫兵的搜查, 参见《北京大学纪事》, 652—653页。

64, 孙是一名朝鲜战争退伍军人, 来自农民/革命者家庭, 社教运动后和聂一起遭到批评, 参见《新北大》, 1968年3月26日; 《聂元梓回忆录》, 88页和169页;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309页。

65, 《新北大》, 1966年9月27日, 第1页。

66, 同上。

67, 最后一项指控是不准确的。见《大字报选(1)》。

68, 《新北大》, 1966年10月18日, 第2页。

69, 《北京大学纪事》, 652页;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151—155页。争论从1966年10月8日的《新北大》开始, 并且持续了两期。争论双方的大字报都刊在《大字报选(3)》上。

70, 《新北大》, 1966年10月8日, 第3页。

71, 见杨勋《宽容》引言和134页。

72, 《北京大学纪事》, 653页。

73, 《新北大》, 1966年11月21日, 第2页。

74, 《北京大学纪事》, 652—653页。

75, 《新北大》, 1966年12月12日, 5—7页。

76，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女儿李纳、江青和一名1965年毕业的北大学生作为毛和聂之间的秘密联络员，参见《聂元梓回忆录》，172—190页；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758—764页。

77，《北京大学纪事》，654—655页。

78，《新北大》，1966年12月24日，第2页，乔兼武贴了一张大字报批评林彪；《新北大》，1966年12月12日，第7页、《新北大》，1968年5月23日，第4页，杨炳章于12月写了一张大字报，把聂描述成了一个“政治妓女”，并且给毛泽东写了一系列私人信件，其中有许多是批评江青的，参见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36—152页。杨公开说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搅起的派系斗争，因而被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标签，参见《新北大》，1967年1月1日，第3页。

79，《北京大学纪事》，655页。

80，没有中央专案组的协作聂根本无法安排这一集会，因为中央专案组控制着这些政治疑犯，参见Michael Schoebhals,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6-79,”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5 (1996), pp. 88-111.

81，《北京大学纪事》，655页。1月3日，江青和康生点名了几名批评者并亲自给他们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其中就包括杨勋和她的弟弟杨炳章。见《中央首长讲话〔1〕》，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3月，17—20页。当康生听到聂对他的批评时，他把聂的北大同事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这个聂元梓太卑鄙了，在延安时我就已经知道。但是现在，就算她是坏蛋、王八蛋，我们也要支持。”北大党史小组《康生，曹轶欧》，36页。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康生就指责聂是与王实味有着密切关系的地下叛徒组织的一员，是次整聂未持续几天就结束了，参见《聂元梓回忆录》，54—55页以及109页。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里，康生和曹轶欧都极不喜欢聂，他们更喜欢大字报的主要作者杨克明，参见《王力反思录》，603、721—722页。

82，《新北大》，1967年1月1日，第2页。

83，《北京大学纪事》，656页；杨勋《宽容》，159—167页；以及杨炳章的《从北大到哈佛》，166—170页。

84，《新北大》，1967年1月10日，5—7页。

85，江青于1月3日做出这一讲话，参见《中央首长讲话〔1〕》，17—18页。

86，《北京大学纪事》，655页。

87，王任重特别反对聂对于权力的垄断，并且公开表示愿意与孔繁和杨克明对话，参见《中央首长讲话〔1〕》，18页。1月王退出了中央文革小组，参见《北京大学纪事》，656页、《中央首长讲话〔1〕》，140页以及《新北大》，1967年1月24日，第1页。

88，《中央首长讲话〔1〕》，236—240页。

89,《北京大学纪事》,657页。见1967年1月28日《新北大》的成立宣言,上面有来自21家大型国企和9所大学造反派组织的签名。

90,发生在1月15日,参见《新北大》1967年2月17日,1—2页;陈焕仁《红卫兵日记》,270—272页。

91,“当时的夺权,好像是谁跑得快,谁先到,先把公章抢到手,权就是谁的了,所以蒯大富他们自己跑掉,就不会告诉我们了。”《聂元梓回忆录》,196页。

92,见2月13和15日戚本禹和谢富治转达的命令。见《中央首长讲话(2)》,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翻印,1967年3月,104和109—110页。

93,《新北大》,1967年3月1日,第1页。聂在红代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是向全国广播的,参见《新北大》1967年3月4日,第1页。

94,《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大专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1967年3月7、14日,第1页。

95,《聂元梓回忆录》,199—202页。

96,同上,202—204页。

97,“天派”包括聂元梓、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和韩爱晶的北航红旗,其名号对后来的院校起到了参考作用。“地派”包括谭厚兰的师大井冈山和王大宾的地院东方红,该派名号来自于后者。见卜伟华《关于文革中北京的天派和地派》,《中共党史资料》第73辑(2000),100—126页。

98,1月22—26日,来自于教育部的造反派、海军学院和其他几所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在北大校园游行示威反对聂元梓。参见《新北大》,1967年1月31日,第2页。

99,见《中央首长讲话(3)》中谢富治和戚本禹的谈话,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42—44页。

100,卜伟华《关于文革中北京的天派和地派》,107—108页;《聂元梓回忆录》,206—208页。

101,《新北大》,1967年4月13日,第6页。

102,同上第7页。

103,卜伟华《关于文革中北京的天派和地派》,109—111页;陈焕仁《红卫兵日记》,304—306页。《新北大》1967年4月13日6—8页有关于冲突的详细报道。

104,同上,1967年4月13日,第2页。

1 0 5, 《北京大学纪事》, 6 5 9 页。

1 0 6,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2 9 6—2 9 9 页。周于1 9 4 9 年之前在芝加哥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并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 后来出任北大校长。

1 0 7,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2 8 0—2 8 5 页。自从社教运动之后郭就和聂站在一起。《聂元梓回忆录》, 8 8 页。

1 0 8, 《北京大学纪事》, 6 5 8 页。1 月份, 两人都得到提升以取代孔繁和杨克明。

1 0 9, 同上, 6 6 0—6 6 1 页。

1 1 0, 《中央首长讲话〔3〕》, 2 7 2 页。

1 1 1, 《北京大学纪事》, 6 5 8 页。

1 1 2, 《中央首长讲话〔4〕》,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 1 9 6 7 年5 月, 1 1 6—1 2 2 页。孙蓬一曾于4 月1 2 日在北大召开过一场群众大会, 会上孙质疑谢富治的左派资格, 并称谢为“两面派”, 认为他利用别人所作的贡献捞取政治资本, 参见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3 0 6 页。

1 1 3, 《聂元梓回忆录》, 2 0 6—2 1 0、2 1 6—2 2 4 页。显然聂没有想到这些人开始对她联合造反派的能力失去信心, 这使得她面临严重的政治可靠性危机。她的回忆录说明此时她已无路可退——地派不停攻击她, 而且聂相信他们代表的是戚本禹, 并且他们的行动也得到了谢富治的默许。

1 1 4,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3 4 4—3 4 7 页。聂的不安全感在5 月2 4 日《新北大》中反映了出来, 这天的报纸完全是关于庆祝“五二五”大字报的, 首页上是一年前聂和毛泽东、康生、曹轶欧会面的大照片。5 月3 0 日的报纸则完全是表扬江青对文艺所做的贡献。

1 1 5, 《新北大》, 1 9 6 7 年6 月1 0 日, 第1 页。

1 1 6, 同上, 6 月1 4 日, 第2 页。

1 1 7, 《新北大》, 1 9 6 7 年6 月1 7、2 1 和2 4 日。6 月2 9 日的群众大会上, 孙蓬一进行了自我批评, 但却遭到了参会反对派的嘲笑; 7 月4 日聂作了自我批评, 参见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3 6 3—3 6 5 页。

1 1 8, 《新北大报》, 1 9 6 7 年7 月1 2 日。

1 1 9, 同上, 第3 页。

1 2 0, 《北京大学纪事》, 6 6 2 页。

1 2 1, 同上, 6 6 3 页。

1 2 2, 《新北大报》, 1 9 6 7 年 8 月 2 5 日, 1 — 2 页。

1 2 3, 同上, 第 1 页。蒯大富称北大井冈山是真正的造反派, 参见《北京大学纪事》, 6 6 3 页。当时, 北大学生听说蒯在秘密支持一个反聂团体, 而聂的支持者则在多个场合公开表扬蒯的派系对头, 参见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3 2 6 — 3 2 7 页。

1 2 4, 《北京大学纪事》, 6 6 4 页。

1 2 5, 《新北大报》, 1 9 6 7 年 9 月 7 日, 5 — 8 页。

1 2 6, 同上, 9 月 1 6 日, 第 1 页。

1 2 7, 同上, 1 1 月 5 日, 第 3 页; 1 1 月 7 日, 第 4 页; 1 2 月 2 2 日, 第 3 页; 1 9 6 8 年 1 月 6 日, 第 4 页; 1 月 1 5 日, 第 4 页。

1 2 8, 《新北大》, 1 9 6 7 年 9 月 1 0 日, 第 7 页。

1 2 9, 《新北大》, 1 9 6 7 年 1 2 月 2 日, 第 1 页。聂元梓为首, 孙蓬一为副。

1 3 0, 1 1 月 2 8 日, 后两者加入了井冈山兵团的核心领导层。《北京大学纪事》, 6 6 5 页, 以及《新北大报》1 9 6 7 年 1 1 月 3 0 日, 1 — 2 页。

1 3 1, 《北京大学纪事》, 6 6 4 页; 《新北大》, 1 9 6 7 年 1 0 月 7 日, 5 — 8 页; 1 0 月 1 5 日, 3 — 4 页。

1 3 2, 《北京大学纪事》, 6 6 6 页; 《新北大》, 1 9 6 7 年 1 2 月 9 日, 2 — 4 页; 1 2 月 1 4 日, 第 4 页。

1 3 3, 《北京大学纪事》, 6 6 7 页; 《新北大报》, 1 9 6 8 年 1 月 8 日, 3 — 4 页; 1 月 1 5 日, 1 — 3 页。

1 3 4, 卜伟华《关于文革中北京的天派和地派》, 1 1 8 — 1 1 9 页。

1 3 5, 《新北大》, 1 9 6 7 年 9 月 2 3 日, 1 — 2 页; 1 0 月 1 9 日, 第 1 页; 1 0 月 2 2 日, 第 2 页。

1 3 6, 《新北大》, 1 9 6 7 年 1 0 月 2 3 日, 1 — 4 页。

1 3 7, 《北京大学纪事》, 6 6 5 页。

1 3 8, 《新北大》, 1 9 6 7 年 1 2 月 2 日, 第 1 页。

1 3 9, 《北京大学纪事》, 6 6 8 页。

1 4 0, 同上, 6 6 8 页。日期署为 3 月 6 日的两篇报道由《新北大报》于 1 9 6 8 年 3 月 2 2 日刊行, 第 4 页。这一期上的其它文章则表扬了谢富治和北京卫戍部队的决定, 并且攻击孙蓬一是叛徒和间谍。

1 4 1, 《新北大》, 1 9 6 8 年 3 月 7 日, 第 2 页。

1 4 2, 《新北大》, 1 9 6 8 年 3 月 2 3 日, 第 1 页。

1 4 3, 《北京大学纪事》, 6 6 8—6 6 9 页;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5 1 4 页; 《新北大》, 1 9 6 8 年 3 月 2 6 日, 1—2 页。

1 4 4, 《聂元梓回忆录》, 2 7 0 页;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5 1 7—5 1 8 页。

1 4 5, 《北京大学纪事》, 6 6 9 页; 《新北大》, 1 9 6 8 年 3 月 3 0 日, 第 1 页。

1 4 6, 《新北大》, 1 9 6 8 年 4 月 8 日, 第 4 页和 4 月 1 8 日第 3 页;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5 1 8—5 2 0 页。

1 4 7, 1 9 6 8 年 4 月 2 9 日的《新北大》, 这一期的内容全部都围绕着集会展开。

1 4 8, 见《新北大》刊行的认罪书, 1 9 6 8 年 7 月 1 7 日。

1 4 9, 这一时期共有三名学生被打死。五月底, 邓小平的儿子, 应用物理学系的学生邓朴方遭到监禁并被迫从校园的一幢高楼上跳下, 因伤致残。《北京大学纪事》, 6 7 0—6 7 1 页。

1 5 0, 同上, 6 7 1—6 7 2 页; 《新北大》, 1 9 6 8 年 5 月 1 3 日, 第 1 页。

1 5 1, 《新北大》, 1 9 6 6 年 6 月 2 0 日, 1—2 页。

1 5 2, 《新北大》, 1 9 6 8 年 7 月 2 3 日, 3—4 页。

1 5 3, 唐少杰《一叶知秋: 清华大学 1 9 6 8 年“百日大武斗”》〔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 0 0 3〕, 3 1 页。

1 5 4, 《北京大学纪事》, 6 7 5—6 7 6 页。

1 5 5, 同上, 6 7 3 页, 以及《新北大》, 1 9 6 8 年 7 月 2 8 日和 3 0 日, 第 1 页。

1 5 6, 《北京大学纪事》, 6 7 4—6 7 5 页;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5 5 6—5 6 1 页。

1 5 7, 《北京大学纪事》, 6 7 5—6 7 6 页。

1 5 8, 同上, 6 7 5 页。

1 5 9, 《聂元梓回忆录》, 3 1 9—3 6 9 页。

160, 1967年4月以后的清华大学, 这种情况就非常明显, 参见 Xiaowei Zheng, “Passion, reflection and survival: the political choices of Red Guards at Qinghua University, June 1966–July 1968,” in Joseph W. Esherick,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9–63.

161, 《新北大报》, 1967年12月22日, 第2页。

162, 北大与北京工业大学极其不同, 在1966年秋季的北京工业大学, 血统论是一个主要的议题, 参见 Andrew Walder, “Tan Lifu: a ‘reactionary’ Red Guar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0 (2004), pp. 965–988.

作者鸣谢: 我十分感谢 Michael Schoenhals 在资料方面无私的帮助以及对于我早期文稿的评论。

英文原文 “Factional Conflict at Beijing University, 1966–1968”, by Andrew G. Walder. Stanford University. 刊载于 *The China Quarterly*, 2006, 188, 1023–1047。该译文经过原作者本人审阅并授权发表。

□ 原载: 《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 Vol. 20, No. 1, 2013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